

## ※學術會議※

# 「文本翻譯與文化脈絡：晚明以降的中國、日本與西方」 計畫緣起及翻譯研究理論的探討

彭小妍\*

## 一、緣起

本計畫緣起為二〇〇三年十二月，中央研究院李歐梵院士在文哲所舉辦的兩場演講，一是十二月十七日的「晚清翻譯及通俗小說初探」，一是十二月二十二日的「福爾摩斯在中國」。李院士於演講後，協同王德威院士，與院內人文所同仁座談，包括文哲所彭小妍及李爽學、近史所黃克武、歐美所單德興、史語所王道還。會中李院士期待中研院的同仁組織一個長期研究計畫，以中研院為根據地，以臺灣及海外知名學者與年輕學者為核心成員，探討相關議題，希望我們能在國際學界方興未艾的翻譯研究課題上，有所貢獻。

其後，透過國科會、哥倫比亞大學蔣經國基金會文化與制度史中心的協助，以及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、新興文化研究中心、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的支持，從二〇〇四年二月起，我們在中研院舉行過五次翻譯研究理論的讀書會，並於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臺北烏來舉行籌備研討會。除了十七位來自臺灣、日本與美國的學者以外，另有十數名國內外研究生參與會議（包括臺灣大學、交通大學、輔仁大學、華盛頓大學、哈佛大學博碩士生）。會議中學者深入交換意見，經過三天的討論後，對計畫的內涵、進行步驟及目標，達成初步的共識，決議組織研究團隊。

二〇〇五年七月，透過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及文哲所的經費贊助，我們在日本愛知縣立大學白樺高原山莊舉辦了第二次研討會，一共發表十三篇論文。目

---

\* 彭小妍，本所研究員。

前我們已獲得中研院主題研究先導計畫的經費補助，擬於二〇〇六年五月二日舉行第二次研討會。此次會議將和北京的跨院校學術團體「日本文化講座」合作，主題是「翻譯與現代主義」，將發表論文六至八篇。以上兩次會議論文，將擇優集結為中文專書出版。未克參加會議的計畫參與者，也將提供完稿的論文，收入專書。

## 二、計畫意義

目前翻譯研究在國際學術界，受到高度重視，學者咸認為是文化研究中，繼後殖民主義研究及後現代研究之後，最具有發展潛力的學科。由於翻譯是跨文化、跨語際、跨領域的實踐，牽涉到至少兩國文化、兩種語文、兩種文化符碼的交流溝通，翻譯研究本身因此是跨領域研究之集大成者。參與我們計畫的學者，涵蓋臺灣文學（黃英哲、呂淳鈺）、中國文學（劉紀蕙、Michael Hill、彭小妍）、宗教研究（李爽學）、日本文學（工藤貴正）、歐美國文學（單德興）、婦女研究（Tani Barlow）、社會學研究（坂元ひろ子）、文化研究（劉禾 [Lydia H. Liu]、酒井直樹 [Sakai Naoki]、廖炳惠）、近代史研究（黃克武）、科學史研究（王道還）等專長，以實踐翻譯研究跨領域、跨學科的特質。

目前國際學界有關翻譯研究方面的計畫，多半是以美國學界或歐洲學界為中心，以召開一次會議、集結專書出版為主，例如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，在英國薩爾佛大學 (University of Salford) 召開的會議「翻譯與衝突」(Translation and Conflict)。國內近年來亦開始有翻譯研究的計畫出現。例如國科會探討歐美翻譯研究理論的整合型計畫，由師範大學英語系邱漢平教授主持，為期兩年，已於一九九九年七月結束。北京清華大學英文系於二〇〇五年八月舉行翻譯研究研討會，也是以探討歐美翻譯研究理論為主。繼本計畫於二〇〇四年開始籌備之後，中華民國比較文學會自二〇〇五年三月起，舉行「文化翻譯與亞洲文學生產」讀書會，定期研讀翻譯理論。除了歐美學者的理論以外，也包括亞洲學者的理論，例如 Benjamin、Sakai Naoki、Lydia Liu、Hillis Miller 等的翻譯理論，其中酒井直樹、劉禾是本計畫的成員，本計畫成員單德興研究員及廖炳惠教授並擔任該系列讀書會的講員。

本計畫結合了臺灣、香港、中國、日本、美國學界，以長期共同研究為目標，尚屬首創。我們期待進行長期的討論交流和共同合作，在中研院建立一個翻譯研究的團隊。歷來翻譯研究理論趨向以歐美研究為中心，晚近酒井直樹和劉禾研究的貢

獻，在於將亞洲研究帶入翻譯研究的視野。我們的計畫期待在此基礎之上，探討翻譯在晚明以降中國、日本與歐美的互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，與歐美的翻譯理論從事有意義的對話。

### 三、二十世紀的翻譯理論

回顧二十世紀翻譯理論，主要的源頭是班雅明 (Walter Benjamin) 的〈譯者的任務〉(“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,” 1923)。班雅明的理論對大多數讀者而言，顯得雲山霧罩、模稜兩可，推究其中原因，可能一方面是他猶太教背景和法蘭克福學派獨特的辯證模式，另一方面是大多數人閱讀的是英文翻譯，和德文原文差異太大。後來的翻譯理論家被迫（或被誘導）不斷地呼應、引申或發揮他的理論，從中得到無盡的靈感；如果說二十世紀的翻譯研究史就是〈譯者的任務〉的註腳，亦不為過。

〈譯者的任務〉開啟的重要概念有二，一是意義 (meaning) 的流動性，一是翻譯作為原作的新生命 (afterlife)。這兩個概念對後來的解構主義翻譯理論產生莫大的影響。班雅明指出，所有個別語言的意義處於一種恆常浮動的狀態中 (in a constant state of flux)，當所有語言透過翻譯達到互補協調的純語言 (pure language) 境界時，「意義」才能與上帝的語言 (the word) 合一。原作唯有歷經演變和重生的過程，才能獲得新生。他認為譯文和原文是互補的，所有的譯文加上原文才能達到純語言的境界。這當然是猶太教神學中巴別塔的隱喻：世人原本使用一種共同的語言，上帝為了懲罰世人妄想通天之罪，摧毀了巴別塔，使人四散各地，從此彼此語言不相溝通，因此翻譯成為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。

班雅明認為，由於語言意義的流動性，翻譯的最終目的如果是想模仿原作，完全是不可能的；正確的概念是，透過翻譯使原作產生蛻變 (transformation) 而獲得新生。他用切線 (tangent) 和圓周 (circle) 來比喻譯文和原作的關係：譯文和原作的接觸點，就像一條切線和圓周的切點那麼細微；在意義上，譯文和原作只有最小的接觸點，譯者則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，就像切線和圓周接觸後，可以無限延伸。對班雅明而言，譯者的任務是透過外國語言來擴充、深化本國語言 (He must expand and deepen his language by means of the foreign language)，使本國的語言產生蛻變。他引用 Rudolf Pannwitz 的說法，指出譯者基本的錯誤就是固守本國語言的現狀，拒絕讓

本國語言受到外國語言的深刻影響<sup>1</sup>。

班雅明以降數十年，理論家一直強調語言及文化的相對性 (relativity)，因此認為翻譯是不可能達成的。到六、七〇年代，翻譯的「對等性」(equivalence) 或「對應性」(correspondence) 成為重要議題，目的是挑戰語言文化相對性的觀點。和班雅明的主張相反，「對等性」理論相信語言和文化的普世性，把翻譯看成是一種傳遞或溝通 (communicating) 外國文本意義的過程。有關對等性的研究，基本上都是規範性的，不僅企圖提供分析的工具來描述翻譯行為，同時也提供評價翻譯的標準。這類理論傾向於把外國文本看成是固定不變的，外國文本可以被分解為各種定義明確的單位、層次和類別，以便理論家從事語彙、文法和風格的解析。這種分析方式，到今天還是翻譯實務課程的基本做法。例如 Eugene Nida、Katharina Reiss 及 George Steiner，都服膺這種理論。

八〇年代一篇翻譯理論課程必讀的文章是德希達 (Jacques Derrida) 的〈巴別塔〉(“Des Tours de Babel,” 1980)，此文等於是〈譯者的任務〉的導讀和引申，奠定了班雅明在翻譯理論上無與倫比的地位。德希達指出，巴別塔倒塌後，翻譯就成為必須而無法完成的 (necessary and impossible) 任務。翻譯的最高境界，就班雅明而言是「純語言」，就德希達而言是「真正的語言」(the true language)；這是翻譯必須達成而無法達成的境界。我們姑且不論這個無法達成的最高境界；翻譯研究所關心的，也是可能產生無限詮釋的，倒是班雅明所說的「原作的新生命」的概念。德希達引申他的概念，進一步指出翻譯所衍生的新生命，並非原作的重建 (restitution) 或忠實的再現 (a faithful representation)，而是超越死亡的新生 (survival)，是一個不斷演變、成長的過程。

九〇年代翻譯研究理論中，將班雅明的理論發揮得最為清楚的，是 Lawrence Venuti (羅倫斯·維努提)。他在 *The Translator's Invisibility: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* (《譯者的隱形：翻譯史研究》，1995年)，以及後來的一系列著作中，系統性探討「歸化」(domesticating method) 和「異化」(foreignizing method) 的翻譯策略<sup>2</sup>。他批判數世紀以來，英語系國家的翻譯規範要求譯文流利透明、讀起來像是英文，以

<sup>1</sup> Walter Benjamin, “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” (1923), in Hannah Arendt, ed., Harry Zohn, trans., *Illuminations* (New York: Random House, 1988), pp. 69-82.

<sup>2</sup> Cf. Lawrence Venuti, *The Translator's Invisibility: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5); Lawrence Venuti, *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: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*

致於使譯者隱形不見。他認為，這種翻譯觀背後隱藏的動機，是帝國主義者企圖消滅異質性的霸權心態；這樣的翻譯策略製造出一種假象，使英語系讀者誤以為英語系文化的價值觀是普世的，連異國文化也信奉同樣的價值觀。因此，這種「歸化」外國語言的翻譯策略，不僅是帝國主義的幫兇，也加強了英語系讀者的拒外症 (xenophobia)。維氏這部著作的主旨，就是以福科系譜學的角度，在歐洲翻譯史中找尋一種另類翻譯策略的系譜，也就是「異化」譯文的翻譯系譜，並期待這種另類的翻譯觀可以和當前主流的翻譯觀相抗衡，以扭轉趨勢。他從德國古典浪漫時期的翻譯實踐談起，直到法國後結構主義對這種另類翻譯觀的提倡。他後來的著作，包括一九九八年的 *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: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* (《翻譯之恥：異質性倫理》)，都是由後結構主義及後殖民主義的立場，反覆辯證歸化翻譯企圖同化異國的心態可議，以及異化翻譯尊重異質性的正當性<sup>3</sup>。

維努提的翻譯理論和德希達及史匹娃克 (Gayatri Spivak) 的後結構主義翻譯理論，是一脈相承的<sup>4</sup>。這種翻譯理論的中心思想，是強調語言的異質性以及意義的多元性，進而討論翻譯的政治意涵。翻譯的目的是傳遞意義嗎？他們主張無論原文或譯文都不是原創的，而是各種文化和語言成分所衍生的 (derivative)。這些不同文化和語言特有的成分，使得作品的意義和所指 (signification) 變得複雜不穩定，經常超越甚至違背原作者或譯者的原意，因此他們認為翻譯不應以語意上的對等性為目標，應保持原文的異質性，探討翻譯的社會、文化和意識形態指標。

維努提對班雅明理論的衍伸，對「透明、流利」的翻譯的批判，則充分顯示後結構、後殖民主義的思維模式。他認為翻譯行為和目的潛藏著一種「暴力」 (violence)：在重新建構外國作品時，總是使之配合本國固有的價值、信仰、和呈現

---

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8); Lawrence Venuti, "Translation, Community, Utopia," in Lawrence Venuti, ed., *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0); and Lawrence Venuti, "Translating Derrida on Translation: Relevance and Disciplinary Resistance," *The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* 16.2 (2003): 237-262.

<sup>3</sup> Venuti, *The Translator's Invisibility: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*, pp. 1-42.

<sup>4</sup> See Jacques Derrida, "Différance," in Alan Bass, trans., *Margins of Philosophy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2), pp. 1-28; Jacques Derrida, "Des Tours de Babel," in Joseph F. Graham, ed., *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* (Ithaca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1985), pp. 165-207;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, "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," in *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* (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3), pp. 179-200.

方式，落入「歸化」外國的陷阱；無論譯文傳遞何種異質性，都無法避免地銘記了本國文化的立場、經典和禁忌、符碼和意識形態。根據這樣的看法，無論歸化翻譯或異化翻譯都難免落入「歸化」異國的陷阱，這豈不等於是自我消解了他對翻譯「倫理」的堅持？如果翻譯研究的倫理，不是強調異化翻譯優於歸化翻譯，而是暴露翻譯行為所必然牽涉到的不對等性和不對稱性，那麼，在這個層面上談「倫理」是有意義的。

#### 四、本研究計畫在翻譯理論上的探討

從晚明以來，基督教文化、思想論述、物質文明等，逐漸展現全球化現象。透過翻譯的引介，中國、日本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加深。根據雅克布森 (Roman Jakobson) 的 “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” (1959)，翻譯可分為三類：語際內的翻譯或釋義改述 (intra-lingual translation or rewording)；跨語際的翻譯，即一般意義的翻譯 (inter-lingual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on proper)；跨符碼的翻譯或轉換 (inter-semiotic translation or transmutation)。在我們的概念中，所謂翻譯所討論的範圍，包括書寫的本文 (written texts)、口傳的話語 (oral discourse)、物質文化的流傳 (circulation of material culture) 等。

在翻譯跨越語言、文化、領域的過程中，符號、概念、話語是否可以交換，如何交換？文化符號和意義，透過什麼樣的機制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流通到各地區？以各文化、語言間的差異性為前提，任何符號、概念、話語的意義，跨越文化、語際之後，是否能和「原型」相比擬；翻譯理論是否可以提升我們在這方面的理解？翻譯行為是否能保證普遍性意義的傳播；在傳播過程中，各地區的獨特性如何在篩選、詮釋、轉化的過程中發生作用？看似普遍性的符號、概念、話語進入異文化後，如何產生變化，對當地文化如何產生短暫或長期的效應？

要討論上述議題，應該理解到，翻譯活動和文化接觸、衝突有直接的關係。在翻譯活動進行時，也就是面對衝突的過程中，個別翻譯者或翻譯的機構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；翻譯者的目標 (agenda) 和翻譯者的能動性 (agency) 是其中關鍵。在眾多性質類似的外文書籍中，翻譯者為何對某些著作情有獨鍾？翻譯者的選擇，是胸有成竹還是機緣 (contingency)？這類問題的提出，意味主體語言 (Lydia Liu 所謂的 “host language”，或傳統所謂的 “target language”) 將是翻譯研究的重心，客體語

言 (guest language, 或 source language) 則在其次。透過翻譯者的引介，異文化的符號、概念、話語進入主體語言後，如何在主體語言的文化脈絡中蛻變、形成新的意義、產生什麼衝擊？我們的研究，不僅重視個別翻譯者所扮演的角色，也強調翻譯文化和翻譯機構型塑、引導、規範的力量。

另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是，翻譯如何把外國文化挪用到本國的文化或政治目標 (agenda) 中？一方面，翻譯在重建國族認同時產生極大的力量，因此可能在種族歧視、政治衝突、殖民主義、恐怖主義甚至戰爭中，扮演關鍵角色。另一方面，翻譯也可能挪用外國作品來奧援或修訂本國的文學經典、學科的知識典範及研究方法、以及醫學的臨床實踐等。在本國語言、文化、自我認同的危機時刻，廣義的翻譯行為如何在歷史關鍵點產生作用，促使譯文的語言、文化或自我觀、世界觀發生蛻變<sup>5</sup>？所謂廣義的翻譯行為，並非只是某個特定文本的翻譯，而是包括詞彙、概念、文體等的隨機性的吸收和流傳，不一定是有意識的或規劃性的。試觀晚明以來中國和日本文學經典的演變，中國白話文和日本「國語」的蛻變。十八世紀文言中文的翻譯成日文，如何影響日本語文的演變和國族思想的形成？一九二、三〇年代中國白話文尋覓新典範的時期，廣義的翻譯如何適時介入，異化外國語言的翻譯策略如何使白話文逐漸產生蛻變，為四〇年代末的成熟期奠定下基礎？梁啟超對翻譯小說的推介，徹底改變了小說為稗官野史的傳統經典觀。嚴復《天演論》的翻譯，使得「進化」的概念在清末民初震撼了中國人的自我觀和世界觀。中日兩國的社會學科，例如心理學、性學、社會學、民族學等，以科學為名達到通俗化和建制化的過程中，翻譯在在扮演了關鍵角色。在探討中國和日本現代化語言和國族意識形成的過程中，翻譯研究是最佳的切入點之一，也是無法避免的議題。

根據目前的規劃，我們的計畫將探討下列四個具有發展潛力的方向：（一）譯者的主動性與翻譯機構；（二）翻譯與國族想像；（三）思想史與翻譯；（四）文學與翻譯。李爽學、黃克武、王德威和 Michael Hill、王宏志、單德興將分別以晚明天主教譯者、嚴復、林紓、晚清、世界日報社譯者群體為題，探討晚明以降翻譯文化中，譯者和翻譯機制鮮明的位置。酒井直樹、劉禾、蘇哲安 (Jon Solomon)、廖炳惠、Haun Saussy、張君玫將探討翻譯與國族想像的議題。Tani Barlow、劉紀蕙、彭小妍和王道還、坂元ひろ子將分別由社會學、心理學、進化論、優生學的角度切

<sup>5</sup> Venuti, *The Translator's Invisibility: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*, pp. 18-19.

入，探討思想史中新興學門的成立發展和翻譯的關係。李歐梵、黃英哲和呂淳鈺、工藤貴正擬由通俗文學和文學理論的角度，探討翻譯如何影響文學次文類和文學理論的發展。在研究過程中，我們也將邀請其他對翻譯研究有興趣的學者，共同探討相關的議題，期待在未來兩年中，能有初步的成果展現。